

〔日〕长谷川庆太郎著

中国『现代化』的幻想

——从新的角度看日中关系

长谷川庆太郎
中国「近代化」の幻想——日中关系の新たな视角
ダイヤモンド社昭和54年10月18日初版発行
根据日本钻石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中国“现代化”的幻想

——从新的角度看日中关系

〔日〕长谷川庆太郎 著

王宗林、王辅基、张慧春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75,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200

书号 4002·297 定价 0.34 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本书是根据日本长谷川庆太郎著《中国“现代化”的幻想》一书 1979 年第一版译出的。

作者长谷川庆太郎，是日本评论家，1927 年生于京都，1953 年毕业于大阪大学工学部冶金系。后在华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书记处工作。回国后，担任志贺义雄的秘书。志贺被日共开除出党时，长谷川也同时脱离日共，一直与志贺主办的《人民之声》保持联系，并经常为该刊撰稿。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长谷川历任日本产业新闻社记者、投资信托事情调查会的股票调查员等。先后著有：《论日本经济实力》、《南朝鲜的经济》、《来自日本股份公司的挑战》等。

《中国“现代化”的幻想》一书的素材，是三菱集团、新日铁等日本大企业中反对同中国进行贸易的一些人提供的。长谷川根据这些素材先写成《中苏和解之日》一文，发表于 1979 年《文艺春秋》第 5 期上，概括地评述了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后于同年下半年出版本书。本书评述范围较广，对我国当前的四化建设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些值得我们深思，当然也有些不见得正确，甚至是错误的（特别是统计数字差错较多）。但是不论如何，对于我们了解一个外国论评家如何看待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参考价值的。

我们在翻译时，对于某些章节，因同全书主题无关而作了部分删节。另外也做了一些必要的编译。译文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地同志曾给予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谨表谢意。

译者

1981年4月7日

目 录

前言 “中国热”之后	1
1958年“大跃进”的意义	2
毛泽东思想相对化的进退维谷	3
变幻莫测的中国形象	5
一、日中经济交流剖析	6
上海宝山钢铁厂	6
日中谈判的内幕	8
正式签订合同	10
武汉钢铁公司的先例	12
“以钢为纲”的现实	14
二、“四个现代化”的意义	18
为什么是“四个现代化”？	18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	20
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21
三、“现代化”能否成功？	25
“经济规划”本身的薄弱环节	25
没有专家治国论者	28
落后的汽车工业	31
没有经济统计的计划经济	33
四、失败的“大跃进”	36
“中国人是伟大的民族”	37

钢铁生产的伟大号召	39
1982 年是危机年	41
通货膨胀怎么办?	44
生活差距扩大后	46
五、中国贫弱的经济基础	49
能源不足	49
受限制的 8% 的工业增长率	52
劳动力没有问题吗?	53
铁路运输的薄弱环节	55
公路和铁路都不足	57
贫弱的港口设备	60
进口设备的账单	62
40 亿美元的利息负担	65
对外收支平衡如何?	67
六、经济发展计划的大转变	70
“大寨样板”的自我批判	70
李毓峰文章的要点	72
1979 年 2 月, 变化的风波	73
对越南的进攻作战	75
终于号召调整	78
七、人民公社解散吗?	81
不增长的粮食生产	81
粮食进口急剧增加	83
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85
“农业现代化”有可能吗?	88
有待解散的人民公社	90
天下再次大乱	92

“为工业服务的农业”	94
尾声——迎接紧要关头的日中关系	97
粮食供应量有下降的趋势	97
农产品的提价	100
对 1979 年农业歉收的估计	102
重工业投资的削减	104
日本赔偿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106
代后记	109

前言——“中国热”之后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这一年，日本的经济界一直为中国的形势所摆布。上半年被称为“中国热”的成套设备出口谈判，随着新年的到来风云突变。二月下旬，已经签了字的成套设备合同一下子全被冻结，日本经济界的气氛为之一变。

其后半年，日本经济界努力以求的，就是如何适应中国方面的“调整”，促使中国解除“冻结”。结果，成套合同的“冻结”全面解除，日本方面总算松了一口气。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逐步了解，日本方面终于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现状和日本方面当初想象的全然不同。于是，“中国热”完全冷了下来。

与此同时，当人们议论中国时，那些曾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人类伟大实验的所谓“盲从派”们几乎不再露面了。更确切地说，想用毛泽东思想建立中国观的主张，已被中国本身正在脱离毛泽东的这一现实所否定。现在不仅要比任何时候更为冷静地注视中国，而且要排除一切主观意向，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方式。

中国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人口将近10亿，些许的经济成长都会被人口的增长所吞噬。将近80%的人口又都生活在农村，农业生产的消长立即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可见，中

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农业。

而且，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农业都无一例外地是致命弱点。依靠集体化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必须以大量投入农业机械和化肥为前提。通过大规模垦荒来扩大农田，这几乎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农业生产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生前的中国，一贯忽视大规模垦荒，而只是在原有的农田上精耕细作，求得增产，打算用自给自足的体制来吸收农村的大量过剩人口。这就是“人民公社”体制。

这样做固然与控制农村的大量过剩人口，不使其流入城市的政策密切有关，但是在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时，却使中国桎梏于十分缺乏流动性的固定的社会体制之中。

另一方面，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工业化一直是经济计划的中枢。从1953年到1957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在苏联经济援助的基础上，第一次建立了平衡协调的现代工业。1958年发起“大跃进”，这种模式就土崩瓦解了。

1958年“大跃进”的意义

现已尽人皆知，“大跃进”是毛泽东倡导的。毛泽东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采取了以“人民公社”、“土高炉”为象征的极左政策，其原因究竟何在呢？至今也没有从中国内部揭开这个问题的盖子。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此时期放弃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而且，这种路线的改变引起了中国随后二

十年的混乱，这已是公开的事实。

同苏联关系的恶化，是中国内部政治斗争带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领导权之争，的确是由毛泽东发起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放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呢？可能是出于对苏联专横跋扈的霸权主义的反对，中华民族主义与苏联扩张主义的冲突，或是同斯大林在感情上的对立等等。

依作者所见，应当从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应有状态，来寻找中苏对立的原因。因为中苏对立引起的混乱，首先是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现代工业及其核心重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中国经济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等接二连三的政治动荡中几经折腾，倍受摧残。

在1978年2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主席发表了“经济发展十年规划”，但不到一年就进行“调整”。到了1979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华国锋主席的政治报告中，甚至连“十年规划”这几个字也不见了。

毛泽东思想相对化的进退维谷

现在的中国，依然是政治就是一切。“四个现代化”归根结蒂是为了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体制，没有其它别的目的。长年来历经苦难生活的中国人民，随着一贯的毛泽东意识形态统治体制的松动，为了自己，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不管是否违背政府的方针，已经开始自发地动了起来。看来，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灭私奉公”的想法不会再抬头了。

本来，中国人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不管是好是坏，中国人总是好抒己见。不是单纯的政治统治，而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中国总算维持了国家的统一。

因此，如果一旦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将陷入混乱和混沌之中。所以，对毛泽东思想大加批判，当前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但是，毛泽东思想既然是“现代化”之敌，要进行现代化就必须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否定。

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成了中国的沉重包袱。中国共产党既然是共产党，它的一切政策必须具有意识形态基础。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必须赋予一切政策以思想基础。不仅政治，经济和文化也都需要有意识形态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只要还不具备一种能取代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那么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有使中国共产党发生崩溃的危险。

此外，随着毛泽东思想的相对化，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即长年来对个人欲望予以克制的共产党干部开始谋求私利。干部们热衷于受贿。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名牌大学，或安插在大企业和政府机关就业。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权图谋私利。

中国四千年的历史造成了当权者营私舞弊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憎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自不必说，直到普通党员也都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图谋私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吸引力之所在。

在中苏对立高涨之时，中国痛斥了苏联共产党干部的特权和贪污，把自己的清廉渲染为中苏对立的原因。而今情况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内也出现了贪污的巢穴，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将迅速丧失道义上的权威。

甚至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正形成贪污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

变幻莫测的中国形象

那么，中国的前景究竟如何呢？这对中国人自不必说，对于邻国日本也至关重要。日本和中国具有一衣带水的关系，从历史上就和中国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中国的混乱与动荡，通过各种形式影响日本。这在地理关系上是无法避免的。

日本与中国之间有海洋相隔，所以中国的变化不会立即直接影响日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直接波及日本。日本倒是对文革作出了严厉的拒绝性反应。日本人过去对中国的印象是充满了对中国人民和毛泽东的敬意的，这种印象已被“文革”一举粉碎。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按照批判“文革”的路线而制定的，从而使一般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显著好转。可是，从1978年至1979年，中国出兵越南，采取了违反国际常识的行动，日本人又开始动摇起来。这种变幻莫测的中国形象的背后究竟存在着什么，这正是本书将要探讨的主旨。

一、日中经济交流剖析

上海宝山钢铁厂

日中两国间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项目,是以新日铁(新日本钢铁公司)为窗口进行谈判的,终于1978年11月末,由新日铁经理斋藤英四郎与中国方面经过最后谈判,正式签订了合同。12月23日在现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举行了动工仪式,开始施工。

宝山钢铁厂第一期工程的粗钢生产能力为300万吨,第二期工程将达到600万吨。这是日中经济交流的核心,也是以1985年为目标的中国“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的橱窗。1978年2月,新日铁会长稻山与中国签订了截至1985年的往来200亿美元的长期贸易协定。与此同时开始的建设宝山钢铁厂的谈判,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个谈判本身突出地说明了中国所处的严峻现实。谈判是从1978年2月开始的。根据中国提出要在1980年末建成投产,日本方面估计会及早谈成并期望当年夏季成交。宝山地处长江岸边的农村。在1932年上海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时,宝山曾经先后两次成为日中两国军队激战的战场。在大片的水田地帯,建设一座年产600万吨钢的现代化钢铁厂,首先要从造地开始,一切都必须从头新建。

需要造地1,000万平方米。为了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

和煤炭,需要建设大型港口。为了向钢铁厂供电,还需要建设一座 70 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长江江水混浊,如果不加以净化,也是无法保证钢铁厂用水的。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中国的经济现实与要在本世纪末建成世界第一流工业能力的政策目标,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这个钢铁厂的建设计划中集中反映出来。

中国方面迫切要求在 1980 年末完成第一期工程,这就成了这座钢铁厂“难产”的第一个因素。

日本的钢铁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战后建成的许多钢铁厂,其技术装备都具有世界最高水平。即使是这样,日本要建设一座年产 600 万吨的钢铁厂,从厂址选定算起,至少也需要八年时间。即使现在动工,也要到 1985 年才能投产,这本身就是常识问题。

现在要把它缩短到两年或三年,显然是勉为其难的。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的局面。首先想到的是砍掉设计。高炉、转炉和轧钢设备,如果重新设计,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如果沿用已有的设计图纸,就能相应地缩短工期。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制造机器设备的厂家可以按以往做过的设备如法炮制,从而多少可以缩短设备制造的时间。

这样,宝山钢铁厂只好把新日铁建设的君津(1968 年投产)和大分(1972 年投产)两座新型钢铁厂原样不动地作为蓝本,所有主要设备都加以仿造,估计这样可以缩短工期。然而,偏偏又出了新问题。

日本的新型钢铁厂都是以使用高品位铁矿石和煤炭为前提的,而中国没有平均含铁量 63—64% 的高品位铁矿石。平

均品位 60% 的铁矿石要经过预处理使之富化，然后加工成自熔性烧结矿或球团矿，方能装入高炉。如果使用中国的铁矿石，号称高性能的日本高炉就会立即降低效能。但是，要日本的新型高炉适应中国的铁矿石，就必须进行颇费时日的矿石预处理研究。由于要求 1980 年末投产，所以没有进行这一研究的余地。

中国方面由于把 1980 年投产作为至高无上的圣旨，终于和日本一样，决定宝山钢铁厂使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和煤炭。中国的铁矿石和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然而，现在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和煤炭，这当然是极其矛盾的。尽管如此，中国只好硬着头皮干，别无其他选择。

日中谈判的内幕

在这期间，谈判进展之缓慢是令人吃惊的。新日铁把宝山钢铁厂的高炉、转炉等重要设备分成十九个项目，其中十个项目由新日铁承建，其余九个项目由新日铁推荐的厂家同中国方面谈判，再由新日铁进行全面协调。

但是，谈判开始之后，发现中国方面只有一个谈判小组。

如果在日本，要建设大型钢铁厂，首先要由公司副经理挂帅，成立机构庞大的建设总部。总部的每个主管部门都设有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对外订货组。然后，要确定建设计划的基础，如最终生产能力、生产品种和完成的年限，再进一步计算炼铁（高炉）、炼钢（转炉）、轧钢和其他主要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在设计高炉主体工程时，要确定所有机械

设备和运输设备的能力，同时也要把电、水、气等辅助设备考虑在内。在设计过程中，要尽可能采用新的研究成果，采用效率高、投资少的建设方式，还要与制造重型机械、重型电机、电子计算机、计测仪表等厂家保持广泛接触，竭尽全力实行技术革新。

安排建设计划，钢铁厂家的技术部门当然要参加，另外，从重型电机、重型机械制造厂到耐火材料、水泥等所有有关材料的厂家；从承担高炉、转炉、轧机等大型设备的基础工程和建筑工程的大型建筑企业，直到承担电线配线工程的电业施工单位，几乎相当于日本全部企业几分之一的企业单位都竞相出售本公司的技术。一个大型钢铁厂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机械和器材，缺少任何一种，钢铁厂都不能开动。

现代化的钢铁厂，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标志。它集中了整个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大钢铁厂里，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应有尽有，从冶金技术人员、机械技术人员、电子和石油化工专业人员，直到给排水技术人员等等。最近，环境保护严格起来，钢铁厂里甚至出现了造林专业人员。

各行各业的专家，带着各自的专业主张共同参加建设计划。把他们各自的见解归纳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计划，并不是简而易行的。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同时，怎样达到经济上的各项要求？例如，怎样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生产能力？怎样筹措建设基金？从折旧费等公司的自留资金中，可以抽用多少资金？怎样发行公司债券和增收股金，以筹措资金？以及如何从银行获得贷款等等……，都要求经理人员煞费一番苦心。

建设总部的工作人员，至少要有两三千人。由于钢铁厂是集各个领域最新技术之大成，要这么多人员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日本，现在能单独靠本公司的工程技术力量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只有新日铁一家。

新日铁是世界第一流的钢铁公司，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钢铁企业中，它的生产成就和技术是首屈一指的。它同三十五个国家进行技术合作，合作项目多达 260 件。

但是，面对中国方面技术力量太差的事实，就连这样一个新日铁也不得不束手无策。中国方面的谈判小组只有一个，而且在技术知识方面也很不象话。一个项目的谈判要长达两个月，要谈妥十九个项目，需要三年多时间。面对这样渺茫的前景，新日铁真不知所措。

正式签订合同

按迄今的累积方式搞下去，宝钢的建设计划不会得出结果，只有通过更高一级的谈判才能打开局面。新日铁终于下定决心。1978 年 11 月 27 日，正在访华的斋藤英四郎经理同冶金部第一副部长叶志强就十九个项目中的十六个项目做成一揽子交易，总金额达 4,000 亿日元并商定按美元和日元各半付款。

12 月 22 日，在上海经过最后谈判，正式签订合同。翌日，在现场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开工仪式，终于破土动工。在这次宝山钢铁厂的谈判中，暴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中国方面的技术水平太低，而且专家极少。谈判小组只有一个，成员至多不过六十多人。但是，这些百里挑一